

希腊古典文化的守护者

□ 陈 良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尽管古希腊在两千年前就已衰落，但它创造的古典文化却延续至今并焕发无穷活力。言希腊，无疑首推雅典，因为在希腊城邦中雅典文明最为辉煌，而雅典的辉煌则与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伯里克利密不可分，马克思曾说过：“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承前启后

西方有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雅典在希腊世界脱颖而出，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断改革与完善的。历史不会忘记，在伯里克利之前，还有两位伟大的政治家梭伦和克利斯提尼，他们都作过重大贡献。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雅典民众推选为首席执政官，随即进行一系列改革。他把国家置于党派或氏族之上，要求一切公民都参与国家事务。他废除一切曾使人民沦为奴仆的债务，并从海外进口谷物，防止粮食短缺。首创陪审法院的新制度，让公民参与法律审判，无论什么案件最后都要送到陪审员面前裁决。创立了“四百人议会”，让人民代表进入议会，参与讨论并决定国家大事，但立法权仍由战神山议会掌握，这个团体被有钱的贵族把持。

在梭伦死后的数年内，庇西特拉德家族掌握雅典政权，实行独裁的僭主统治。这些僭主的统治方式日益严苛，最终失去人民的支持。公元前510年，在斯巴达的帮助下，雅典望族领袖克利斯提尼联合平民推翻了僭主统治。克利斯提尼执政期间，进一步推进改革。他首先撤销了以家族势力为纽带的四个传统部落，把公民分成十个部落，每个部落都平均分配着商人、农民、工匠和地主。以五百人议会代替梭伦创立的四百人议会，为了大家机会均等，确定以抽签方式选出任期一年的议会成员。提高人

民大会的立法权，每年选出十名将军负责执行议会和人民大会的决议，在战时统领城邦的军队。为了防止暴君的出现，制定了一项法令——陶片放逐法，若任何人被认为对这个民主城邦构成威胁时，人民可以投票放逐他。

梭伦、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为雅典铺平了通往繁荣的道路。作为后继者，伯里克利不仅在思想理念上与先贤一脉相承，而且在血缘上也有些关系。伯里克利出身于名门贵族，父亲是在迈卡里会战中击败波斯国王的将领，母亲是克利斯提尼的侄女。伯里克利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年轻时广泛涉猎史诗、哲学和音乐，并练就强健体魄。虽然出身贵族，但在为人处世方面，伯里克利总能跳出贵族的框框，不受“屁股决定脑袋”的局限，尤其在政治方向上，他坚定地选择走民主改革之路。

锐意改革

从政之初，伯里克利追随民主派领袖厄菲阿尔特，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当时雅典大权被军事领袖西蒙与保守派人士所掌握，他们阻止平民在政府内参政。公元前462年，西蒙主动率军援助斯巴达镇压农奴起义，而斯巴达当局并不领情，很强硬地要求西蒙收兵回国。西蒙灰溜溜归来，雅典民众大为愤慨，指责他丢尽雅典人的脸，使城邦受到斯巴达人的羞辱。公元前461年，雅典人决定将西蒙驱逐出境并流放十年，保守派为报复此事暗杀了厄菲阿尔特。随着两位领袖人物的离去，伯里克利得以在雅典政坛扮演重要领导角色，并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在政治生涯后期，伯里克利拥有崇高威望，十多年里每年连选连任雅典最重要的官职——首席将军。

执政期间，伯里克利锐意改革，使雅典民主政制更加完善。他致力于扩大公民的权利，除十将军外，一切官职向所有等级的男性公民开放。确立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年满20岁的男

性公民都可以与会并有发言权和表决权；五百人议事会作为公民大会常设机构，议会成员通过抽签从10个部落中各选50人产生，分组轮流执政，负责召集公民大会并处理日常事务。推进司法改革，确立陪审法庭是国家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由10个部落从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选举组成，每部落各选600人。首创“公职津贴”制度，向参与政务或出席陪审的公民发放工资和津贴。注重公民接受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为艺术家提供宽松的创作环境，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以丰富大众的精神生活。

在对外政策方面，伯里克利注重扩大雅典的势力和利益，加强对盟邦的控制，将提洛同盟变为雅典主导的“海上帝国”。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由雅典直接掌握，联盟基金实质上成为“贡金”。同盟会议此后不再召开，雅典以盟主身份发号施令处理有关事务。

走向辉煌

雅典曾于公元前480年遭受波斯人入侵，整个城邦损失惨重。在伯里克利领导下，雅典人民以极大热情致力于重建家园，很快又创造出一个个繁荣富强的雅典。雅典卫城建造得美轮美奂，卫城正门、各个神庙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塑像、浮雕无不精美绝伦。雅典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中心，意大利、西西里、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和伯罗奔尼撒的货物都汇聚到这里交易。无论是在国家和私人财富方面，雅典都远远超过同期的希腊其他城邦，公职薪酬、城邦节庆、公共建筑等方面开支远低于财政岁入，国家财富储备充足。与此同时，雅典文化也空前繁荣，在建筑、雕刻、哲学、历史、戏剧和自然科学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哲学家苏格拉底、芝诺，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就是这个时代所涌现出的璀璨明星，至今依然星光闪烁。

想熏陶下至少有几点特征出现。

第一，由于开科取士决定了精英（即所谓的“士”）之产生，导致了“唯有读书高”的世风。一切要出人头地的国人之精力，全部集中在读书与争取功名的努力上。有了功名才有社会地位，也是一切荣华富贵的开端。故中国与西方历史发展最关键相异之处，即是在科举制度之下对经商与对财富之追求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自先秦商鞅变法以来，家庭财富以前由长子继承的办法遭到废除。由于家庭财产的继承悉由各子女分摊，所以无论多么大的家产，经过诸多子女分摊之后，不出几代其家产将得分无法再有资本累积，以供资本主义市场所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另一原因。更因为读书人十年寒窗取得功名后，如不是忙于仕宦生活，就是沉溺于读书人的诗画琴棋的雅兴之中，所以不注重科技发展。中国在汉朝之前，曾有火药、指南针等诸多发明，开世界之最。而科举制度在汉朝开始不定期试行时，《后汉书》犹有张衡发明浑天仪与浑地仪之记载。但科举在唐朝盛行之后，中国科学却停滞不前，正是因此之故。

第二，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并非人权的绊脚石，只不过是整体民（族）权概括了（甚至掩盖了）人权而已。如以民权看中国近代的需要，那就是如何甩脱外来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与剥夺，就是如何让举国脱贫解困，并一洗东亚病夫之耻辱，再度找回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由公元713年至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的1000多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曾是世界第一，比全部欧洲加起来都多。所以，今日中国

毫无疑问，雅典繁荣兴盛是伯里克利改革取得成功的最好见证。制度安排使人民当家作主，长期实践的经验使雅典政府运转自如，廉洁高效。五百人议事会每年换届一次并且抽签选任，他们以全委或委员会的形式进行工作，有各种行政官员和精干的秘书班子协助，能够有条不紊地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务。在国内和海外共有1400名行政官吏，绝大多数也是每年一换，并用抽签法选出；每个人在离职时都要为任职时的行为负责并接受当局的审查。6000名陪审员用抽签选出，一般都常年出席法庭，审理雅典人和盟邦人提出的各种案件。因此，雅典公民拥有相当丰富的行政和司法经验，是那个时代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正是这种广泛而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使得雅典公民拥有当家作主的能力，确保人民大会能够妥善处理战争与和平、内政和外交等重大事项。

伯里克利时代，在雅典公民身上，智慧与行动、深思与坚毅、私人利益与公共责任是和谐一致的，正是他们的丰富性成就了雅典文明的丰富多彩。遗憾的是，雅典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给斯巴达，从此走向衰落。

现在看来，雅典民主政制存在一些弊端，且不说它不是充分的民主，就是这种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形式，也容易出现“民众的盲目”“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和“党派之争”等问题，故而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人掌舵。但像伯里克利这样拥有杰出才能和非凡魅力的政治家可遇不可求，在他感染瘟疫不幸去世之后，后继领导者缺乏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致使雅典在战争中败北。当然，伯里克利的政策也并不完美：他谋求雅典霸权不仅使对手斯巴达感到惧怕也引起盟友不满，此外他规定父母双方皆为雅典公民者才能成为公民的做法缺乏包容性。尽管如此，伯里克利仍不愧为“雅典黄金时代的缔造者，希腊灿烂文化的守护神”。

人物志

传说当年伏羲从甘陵出发，迎着阳光升起的方向，来到了万里无垠的中原，他放开眼光，打量这莽莽乾坤，仰观长天、俯测大地，他竟然用上了一套专门的测天仪器：圭表。这是中国最早启用的测量仪器。

圭表由一根标竿加一个土圭组成。圭身长条形，初用土制，后改用玉制、石制，圭身平面中线刻有长槽，用以注水。圭身横躺着，标杆直立着，构成直角，让日影正好落在圭板上，圭板上有刻度，用来标示日影的长度。使用时，在圭槽中注上水，以保证圭板放置的绝对水平。一天之中，日影最短时为正午，正午时日影所在的方向为正北，反向为正南；南北连线直角交叉线则指向正东与正西，以此定出了四面、八方——中国人由此明确了“空间”的概念。

《周礼》中的《地官·大司徒》篇说，“（前人）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就是指这个说的。因为不同季节、不同地点、不同时刻日影的长度不同，日光投影的刻度不同，通过长期的观测记录，比较研究，就可以获得不同时空节令的相关数据。

中原大地太辽阔了，伏羲及其后继者发现：在南北不同地点，正午时间测出的日影并不一样长。在反复测量中发现，在某一个地方的正午时分，放置圭表观看，标竿下“无影影”，这样就把放置标杆的地点视为“地中”，而这个时间点被命名为“天中”，以“地中”为坐

标，可推演其他地点的“经纬度”。日影刻度记下了，据此可测定一昼夜十二时的起止点、推算出一日一百刻、一月三十天、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的起止点；进而确定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天，以及十二年一周天，三十年一世、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演变；由此衍生出天文、历算、农事安排、动植生死的一系列知识来。它通过“测量”，测出了“天”“地”的运行规律，找到了时空转换的法则。这是当时最精密的时空测算，且与农业生态息息相关。埃及金字塔、玛雅祭天台对“天文”的精确测算，构建神奇，但那更多是服务于“神”的，比较而言，中国先民更加密切地关注社会民生。而且这种仪表投入极低、技术简朴直观，易于普及。

“圭测日影”法是中华文明曙光初露时期的头等科技发明。今河南汝阳县有座“天中山”，其实是一个人造土山包，传说那就是伏羲测定的“天中”所在地。今河南登封还有一座周公的“观象台”，经郭守敬整修过，至今保存完好，它便是一个巨型土圭的“升级版”。

时空概念的获得，是中国先民进入文明生活最重要的科学知识。长年不间断的日影测定，使先民不断获得生产环境的数据，让先民学会了与周围生态周期性的变化相适应、相关联，从而形成了周而复始、天人合一的理念。由此看来，对于生活在北温带的中国先民来说，圭表的意义非常重大。



（上接1版）所谓的“突破性的阶级关系转变”即是指原先的这些贵族或封建领主，却因此而摇身一变成了新兴资本家。不但是他们身份改变了，而且这一批新兴富商的经济实力造成了与王室所独断的政治权力之间更猛烈的相争与抗衡。结果是王室让步，这也导致日后议会先驱组织的出现。

由于国王与议会此衰彼兴的关系，所以原先纵面关系之主导性逐渐被横面关系所取代。议会成员最初多来自封建领主，导致封建制度逐渐被议会政治所替代。以前的社会统治权责全属帝王和上层阶级的垄断，从此不再，而被新兴的民主与自由观念所代替。这种社会多元之间平等化的观念与制度，以后也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资本家与工会间的抗衡。

这种横面关系，在政府架构中更演变成了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间的彼此分权与互相牵制。当然这种现象，在美国比英国更较显著。可是，无论是美国式总统制的民主或是英国议会制制的民主，其横面抗衡之存在均属事实。而且这种横面抗衡，在民间还见诸法院原告与被告间的抗衡之上。甚至在立法机关席位的安排上，执政党议员与反对党议员彼此分开而坐，也在形式上代表了此种横面抗衡的精神与意义。

总之，西方的民主政治，来自人们渴求对绝对王权窒息之下获得解脱。而西方之人权呐喊，是代表人们力求由高度组织化教会严密掌控个人思想的窒息下获得释放。讲到这点，我们须要注意的是，西方民主政治与人权的到来，俱有一个共同点，即二者同是反抗窒息控制的产物。因此，它们也有一个共同属性，即它们均有内含的抗争性。

中国的“民本社会”源远流长

在中国，相对的观念与实践，是有别于人本的民本，即个人包含于集体之中，故曰民权（至20世纪初则演变为民族权），而非人权。其出现，可追

溯至公元前的汉朝。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试办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于是，乃有公孙弘“布衣卿相”之美誉，带来了功名代替世袭的传统。世袭制的废除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早，但民国以来某些自命时髦的国人对汉武帝尊孔的动机却颇有微词。我认为如要探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动机为何，首先须正视儒家的两点教诲：儒家之“有教无类”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二者均足以证明汉武帝之所以采取儒家思想，绝非因为它可用作奉承王权至上的凭据。譬如，若是因为孔子“有教无类”而有更多人受到教育，那么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将很难再像目不识丁的人们那样能盲目接受昏君与强权。同样，任何心存独裁之统治者绝不会愿意接受“君为轻”的思想。所以，我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接受儒家思想与开科取士，是为了针对当时豪门兴起的威胁而做出的反制。豪门代表了一股足以威胁皇权的经济势力，而且这个经济势力是可以世袭继承的，正如皇权世袭一样。但在儒家思想定为正统之后，再加科举制度的选贤任能，不可继承的知识与德育必将取代可以继承的财富作为社会精英产生之准绳。何况决定社会升迁的科举制度又是控制在皇室手中。如此，则豪门对皇室之威胁不再存在。

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而言，这显示中国文化中的民本（即孟子所谓“民为重”）的思想，早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得到权威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自此开始，社会上个人地位的升迁乃决定于知识（智力）的掌握，而非拥有财富或资产，亦非决定于世袭或祖荫（除了皇帝以外）。因为功名不可世袭，所以中国历来没有西方以财富决定并可世袭的社会阶级，这点造成了中国与西方一个绝大不同的传统。而西方人对此往往并不觉察。

中国社会在传统文化下更多特点异于西方

以上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儒家思

要彻底脱贫，还要以寻回故有光辉历史文化来追求今日的中国梦，正是此意。这也是发挥民族权的一大步骤。西方人权狭窄的关注，绝对不能达到中华民族民权的需求。与西方相比，正如以上所述，西方的人权是来自传统时代个人因受到高度组织化教会窒息般掌控之一己之思想与良知而渴望求得解脱解放的迫切感。而中国在相当的时期，因没有类似西方的高度组织化教会对思想窒息的控制，所以没有类似西方向往个人人权迫切感之驱使。反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唤起了近代急需维护民族权的迫切感。

第三，开科取士形成民间基层出众人才有机会被发觉而纳入上层精英之列。他们这些被泛称为“士大夫”的人们，在民国以来时髦的反旧礼教声浪中，颇受误解与污蔑。其实，如果以现代政治学的民主理论来观之，这些人土，等于是中国的上层阶级（即“国”的层次）与下阶层（即以“家”为中心的社会基层）中间的桥梁，他们起了下情上传的作用，也将国家所需与所期向家族社会转达。如此将国与家联合一起，故家国与家而为国家，也就是相当于发挥现今民主国家议员与职业政客的功能。这样的效果，用现代话来说，等于是一种立体协商政治。美国学者奈斯比特认为中国今日堪可代表一种“立体民主”，其实在中国早已是如此，只不过是有其实无其名而已。

第四，自儒家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家族，这点有几重意义。其一，由于家族的生活笼罩，所以个人均有归宿感，以别于西方个人与社会分离的经验与心态。其二，每个家族俱有祠堂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之基础；个人俱有“入孝出悌”的法度与深厚习惯，所以世间很难看到“犯上而作乱”的倾向。也因为此，中国历史以来，“治世”远比“乱世”要长。纵使皇帝本人，亦须“以孝治天下”；并且由于“祖制”与御史制度之约束，再加一般皇帝常须等臣子上奏方作决策的惯

例，所以，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帝王制度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西方在传统“绝对王权”时代强势专制的程度。基于这种种原因，在中国传统历史中，无论何时的改朝换代，其原有的社会制度与“士大夫”族群，始终有其存在延续的必然性。故纵使是改朝换代，改变的是统治阶层（包括皇帝），但其原有之统治制度始终未变（一直到1911年）。再重复一遍，与上述之西方历史演变相比，中国在实质上没有西方“绝对王权”的经历，所以社会群体没有遭遇到类似西方政治上窒息般控制而有急需推翻现行政治制度的迫切感。清朝在1911年被推翻后产生的民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次彻底改变。追究其原因，是中华民族面临弱肉强食的外来侵略。而中国早先的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士大夫治国模式，已不足以救中国濒临被列强瓜分灭亡的危境。请注意，孙中山的革命，历经九次抛头颅洒热血的努力，均告失败；而其第十次黄花岗之役终告成功，该年正好是废除科举制度后的第六年。在这六年中，那些耕耘十年寒窗准备参加科举的年青志士，霎时间面临前途希望毁灭的绝境，于是在绝望之余统统投身于孙中山的革命阵营。所以，才有黄花岗之役的决定性成功。这番彻底毁灭改变的肇因，乃是外来强权的威胁震撼；而科举的废除，不过是一个恰巧推波助澜的时机。两者相应配合正好促成了封建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第五，中国没有与西方教会可比的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所以中国人也没有遭受到类似的对思想与良知窒息控制的感受。虽然汉武帝钦定儒家思想为正统，但始至汉朝的儒家，已参合了春秋时代各家思想之精华。由于儒家不排除他家思想，所以连汉武帝自己除了尊孔以外，还兼信其他各家之所长。这正是儒家“集大成”理想的表现。

第六，上面追踪西方历史上的演变，是政治权势转换的关键。由于时代转换，西方社会上横面均衡逐渐掩盖了纵向抗衡的主要性。中国自科举之兴以来，变成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所谓“万般皆下等，唯有读书高”的言语，就代表了这个现象。用现代话来讲，即世间除了仕宦一途之外，其他职业均被边缘化而不足轻重。因此以上所言关于西方政体的横面对抗与均衡，在中国并不显著。所以，中国的政体，自传统以来其主要之表现乃是上下阶层（即中央与地方）纵面的交往与相应。而且尽管地方官员口头上与文字里对皇上绝对遵从效命，而实际上常常是各有盘算，甚至尾大不掉也常常发生。所以，在中国历来论政治得失，常有中央须集权领导与运筹帷幄的主张。故治国之道，有主张集权而非放权之说。尽管理论上如此说，但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妥协共荣、彼此相让的现实。此即为美国学者奈斯比特认为中国的政体事实上有“立体民主”的原因。侯复五在书中将地方镇关重臣作为可能牵制皇室专权的一股力量，兼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分权制衡作用，正是此意。

根据以上的中西文化（与纵观的历史）比较，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中国不是没有民主，而是，它的“立体民主”与西方不一样。何况，在朝廷之内，有诸如祖制与御史对皇权的实际约束，以及皇帝通常必须有臣子之奏折方有机会批示以表达皇室“谕旨”之传统惯例，这等于是现代政治学中的一种横面之分权与牵制。而这种种形式上的差异，正好是由于文化与历史背景不同所致。而其民主实质与精神，不应因形式有异而否定它的存在。

第二，同样，中国不是不注重人权，而是将人权概括于民族权之中。在这点上与西方人权相比，我们不妨将民族权称之为“宏观的人权”。这个与西方的差异，也是出于文化与历史差异所致。这不但是意义上的差异，而且是在形式上的表现不同。

第三，依据以上两点结论，我们可以做出另一项结论，那就是西方人将他们的微观的人权以及横面的民主政治定为“普世价值”，至少在中国的民族权（即宏观的人权）以及“立体民主”的对照下，他们的普世性出了严重问题。